

## 兩篇清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考釋

何冠彪

香港大學中文系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收錄了兩篇清初的〈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據碑文的拓本，第一塊「金太祖、世宗碑」在「順治十八年(1661)九月六日立」(以下簡稱此碑為「順治碑」，碑上刻文為〈順治碑文〉)。<sup>1</sup>從拓本所見，「順治碑」的上下兩端都有剝蝕，以致文字模糊不清，幸而有文獻可考，不難辨識其中文字。

又據碑文的拓本，第二塊「金太祖、世宗碑」在「康熙二年(1663)九月一日立」(以下簡稱此碑為「康熙碑」，碑上刻文為〈康熙碑文〉)。<sup>2</sup>與〈順治碑文〉拓本相同，〈康熙碑文〉拓本也有些模糊不清。但相對來說，後者模糊的面積較小，字樣亦較清晰。其次，〈康熙碑文〉亦有文獻可供稽查，模糊的文字皆可辨識。

上述兩碑雖然分別在順治十八年和康熙二年立，但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卒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sup>3</sup>換言之，上述兩碑都是在清

<sup>1</sup>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清一)》(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1冊，〈京〉9023，頁180。按：該書指出，此碑在「清順治十八年(1661)九月六日刻。碑在北京房山縣柴廠金陵。拓片高212厘米，寬77厘米。正書，漢、滿合璧」。參下注末按語。

<sup>2</sup>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清二)》(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冊，〈京〉9025，頁20。按：該書指出，此碑在「清康熙二年(1663)九月一日刻。碑在北京房山區周口店西北柴廠金陵。拓片高219厘米，寬76厘米。正書，漢、滿文合璧」。又按：「順治碑」與「康熙碑」末日期後作「立」字，不作「刻」字。

<sup>3</sup> 巴黎(?)–1690)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年)，卷一四四「順治十八年正月丁巳」條，頁1105。

聖祖(愛新覺羅·玄燁, 1654–1722, 1661–1722在位)即位初期建立的。但是, 我們找不到當時任何有關順治十八年和康熙二年立碑的歷史記載。相反, 有幾種重要的清代官書指出, 「順治碑」在福臨卒前數年已經建立(詳下文)。

「順治碑」之所以建立, 導源於順治十四年(1657)正月十五日福臨下諭禮部修葺金陵一事。在論文中, 福臨追述金陵在明代(1368–1644)末年遭受破壞的經過。引錄如下:

明季國運衰微, 因我朝克取遼東, 誤疑金代(1115–1234)陵寢旺氣相關, 遂將陵後地脈掘斷。又因己巳年(明崇禎二年, 後金天聰三年, 1629)我太宗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 1592–1643, 1626–1643在位)統師入關, 追念金代先德, 特遣王、貝勒、大臣往陵致祭。乃故明復將陵前石柱等拆毀, 建立關帝廟, 鎮壓風水。<sup>4</sup>

福臨不但抨擊明朝因迷信風水而摧毀金陵, 而且命令禮部官員修葺金陵的損壞。他說:

朕思天祚本朝, 於金何與。故明不思運數有歸, 輒毀及金代陵寢, 愚誕甚矣。除金太祖(完顏阿骨打, 1068–1123, 1115–1123在位)、世宗(完顏雍,

<sup>4</sup> 同上注, 卷一〇六「順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條, 頁827。按: 諭中提到皇太極遣人祭陵之事, 發生於己巳年十二月十一日(1630年1月23日), 參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 1990年), 第12冊, 「天聰三年己巳十二月十一日辛酉」條, 下冊, 頁965–67; 圖海(?–1682)等:《太宗文皇帝實錄》, 《清實錄》本, 卷五「天聰三年十二月辛酉」條, 頁82–83; 阿桂(1717–1797)等:《皇清開國方略》,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年), 〈史部〉99〈編年類〉, 卷一二〈太宗文皇帝〉, 頁三〇上至三二下(第341冊, 頁186–87)。但是, 以上三書都沒有記及明朝拆毀金陵一事。至於明朝之所以在金陵廢址上建關帝廟, 是因為明朝非常崇拜關羽(160–219), 萬曆十八年(1590)加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 萬曆四十八年(1614)更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盧湛〔彙輯〕:《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 嘉慶壬戌〔七年(1802)〕江蘇寶蘇書局重刊本, 〈歷代封號〉, 頁一下至二上), 希望藉此而得到關羽佑護, 得享天下盛世。錢謙益(1582–1664)〈關繆侯像贊〉說:「惟壯繆侯, 虎臣國士。王封帝號, 崇我明祀。羯奴蛾賊, 盜賊之靡。游魂未滅, 惟帝之恥。都山鐵刀, 東沸黑水。長沙銅柱, 肅鎮南紀。陰護金繩, 陽燿玉璽。佑我皇明, 億萬年只。」(載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下冊, 頁1735)錢謙益對關羽的期望, 反映了晚明人的心態。有關明廷對關羽的崇祀, 參看郭松義:〈試論明清時期的關羽崇拜〉, 《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3期(1990年8月), 頁127–39; 文廷海:〈論明清時期「關羽現象」的演變和發展〉, 《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1999年11月), 頁30–38; 蔡東洲、文廷海:《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1年), 頁155–7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兩篇清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考釋

1123-1189, 1161-1189在位)已入帝王廟祭祀,其陵寢照舊守護,地方官春秋致祭外,爾部即遣官前往房山看視金陵周圍,如切近處所果有毀壞,即酌量修整,仍撰文一道,敘述緣由,祭告立碑,以誌不朽,其關帝廟仍舊留存。<sup>5</sup>

論中所謂「立碑」,無疑是指立「順治碑」;所謂「文一道」,當指刻在碑上的文字,即〈順治碑文〉。

據《世祖章皇帝實錄》記載,清廷在順治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建立金太祖、世宗陵碑」。九月十六日,「以修葺金太祖、世宗陵工竣,遣官致祭」。<sup>6</sup>《世祖章皇帝實錄》在記述前事後,更附錄了碑文。逐錄如下:

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於天下。及其歿也,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貺,實亦遐邇之所繹思。故時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於當年,園寢溷於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寰區,於前代陵墓未嘗不惓惓於心,申飭所在,守護惟謹。惟金代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於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遂剷斷其地脈。己巳歲,我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念金代先德,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明復加摧毀,且建立關帝廟,為厭勝之術。夫不達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於風水,移災於林木,何其誕也!金代垂祚百有餘年,英主哲辟,實光史冊。乃易代之後,兆域荒圯,祀典缺廢。撫今追昔,慨焉興嘆。金太祖、世宗已經崇祀帝王廟,其陵寢命地方春秋虔祀外,茲特諭禮臣專官省視,修其頽毀,俾規制如初,併令有司時祭無斁。嗚呼!廟貌既崇,特景思於往哲;封塋重煥,用昭示於來茲。爰勒貞珉,以垂不朽云爾。<sup>7</sup>

如果我們將這篇碑文與前引福臨命禮部修葺金陵諭加以比較,便會發現碑文其實脫胎自諭文,沒有甚麼新的內容或觀點。本來,清朝在順治二年(1645)三月已將金太祖、世宗崇祀歷代帝王廟。<sup>8</sup>他們為何到順治十四年才有修葺金陵之舉,不得而知。無論如何,這次修葺的工程不見得龐大,自下諭修陵至「陵工竣,遣官致祭」,不過九箇月而已。

有關福臨下諭修復金陵和立碑的時間,其後的官書如《皇朝通典》與《皇朝文獻通考》,跟《世祖章皇帝實錄》所述,並無二致。如《皇朝通典》說:「〔順治〕十四年

<sup>5</sup>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〇六「順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條,頁827。

<sup>6</sup> 同上注,卷一一〇「順治十四年六月己丑」條,頁861;卷一一一「順治十四年九月乙卯」條,頁873。

<sup>7</sup> 同上注,卷一一〇「順治十四年六月己丑」條,頁861-62。

<sup>8</sup> 同上注,卷一五「順治二年三月甲申」條,頁130;「順治二年三月丙戌」條,頁131。



正月，……諭禮部……遣官往房山，視金陵周圍，如切近處果有毀壞，即酌量修整。……六月，立碑於金太祖、世宗陵，世祖章皇帝御製碑文勒石。」<sup>9</sup>《皇朝文獻通考》記載更為詳細：「〔順治〕十四年九月，以修葺金太祖、世宗陵工竣，遣官致祭。先是，正月諭禮部……遣官往房山，視金陵周圍，如切近處有毀壞，即酌量修整。……尋於六月立碑。至是工竣，遣官致祭。」在記述修葺金陵的始末後，《皇朝文獻通考》並收錄「世祖章皇帝御製碑文」。<sup>10</sup>

既然上述官書均指金太祖、世宗陵碑在順治十四年六月建立，現時所見「順治碑」上所刻「順治十八年九月六日」的立碑日期，便令人費解。如果是《世祖章皇帝實錄》、《皇朝通典》和《皇朝文獻通考》所述日期錯誤，則此碑何以在陵工完竣後四年才建立？諸書又何以有此誤聞？如果是〈順治碑文〉的日期有問題，情形就更為複雜。難道「順治碑」不是順治十四年建立的原碑，而是在順治十八年再立的新碑？抑或〈順治碑文〉不是順治十四年的原刻，而是順治十八年的重新磨刻？不論是碑重立或是碑文重刻，為何有此需要？又何以偏偏發生在福臨身後？凡此問題，不容易解答。因此，「順治碑」建立一事，仍須進一步探討。

另一方面，〈順治碑文〉與《世祖章皇帝實錄》、《世祖章皇帝聖訓》、<sup>11</sup>《皇朝文獻通考》、<sup>12</sup>《欽定日下舊聞考》、<sup>13</sup>《畿輔通志》<sup>14</sup>等官書所載碑文不無出入。現表列如下，以便說明：

- <sup>9</sup> 嵇璜(1711-1794)等：《皇朝通典》，《十通》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四九〈禮·吉九·祀·歷代帝王〉，第3冊，頁2318。
- <sup>10</sup> 嵇璜等：《皇朝文獻通考》，《十通》本，卷一一〇〈群廟考二·歷代帝王陵〉，第19冊，頁5893-94。
- <sup>11</sup> 福臨：《世祖章皇帝聖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部〉169〈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卷四〈重祀典〉，頁一一下至一二下(第411冊，頁130-31)。
- <sup>12</sup> 本文所用《皇朝文獻通考》，除注10所用版本外，尚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部〉392〈政書類〉)，書中所載「世祖章皇帝御製碑文」見卷一二〇〈群廟考二·歷代帝王陵〉，頁六上至七上(第637冊，頁627)。
- <sup>13</sup> 于敏中(1714-1779)等：《欽定日下舊聞考》，(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部〉257〈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卷一三二〈京畿·房山縣三〉，「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頁五下至六下(第499冊，頁116-17)；(二)內府刻本排印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一三二〈京畿·房山縣三〉，「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第7冊，頁2121-22(按：據書首的〈出版說明〉，此書是「根據內府刻本排印」〔第1冊，該說明頁7〕。參看注26)。
- <sup>14</sup> 唐執玉(1703年進士)等：《畿輔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部〉262〈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卷七〈宸章·世祖章皇帝·金太祖、世宗陵碑文〉，頁一上至二上(第504冊，頁108-9)；李鴻章(1823-1901)等：《畿輔通志》，光緒十年(1884)刻本影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卷八〈帝制紀八·宸章一·世祖章皇帝御製文·金太祖、世宗陵碑文〉，第1冊，頁305。

兩篇清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考釋

147

	《世祖章皇帝實錄》	《世祖章皇帝聖訓》	《皇朝文獻通考》	〈順治碑文〉	《欽定日下舊聞考》	《畿輔通志》
1	及其歿也	及其歿也	及其歿也	及其沒也	及其沒也 (其沒也)	其沒也
2	時代雖遙	時代雖遙	時代雖遙	時代雖遙	世代雖遙	世代雖遙
3	園寢溼於異世	園寢溼於異世	園寢溼於異姓	園寢溼於異世	園寢溼於異世	園寢溼於異世
4	朕撫有寰區	朕撫有寰區	朕撫有寰區	朕撫有九有	朕撫有九有	朕撫有九有
5	申飭所在	申飭所在	申飭所在	申勅所在	申勅所在	申敕(勅)所在
6	守護惟謹	守護維謹	守護惟謹	守護維謹	守護惟謹	守護惟謹
7	惟金代之陵在房山者	惟金代之陵在房山者	惟金代之陵在房山者	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	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	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
8	地脈	地脈	地脈	地脉	地脉(脈)	地脉(脈)
9	己巳歲	己巳歲	己巳歲	又己巳歲	又己巳歲	又己巳歲
10	金代先德	金代先德	金代先德	金朝先德	金朝先德	金朝先德
11	關帝廟	關帝廟	關帝廟	關廟	關廟	關廟
12	夫不達天命之有歸	夫不達天命之有歸	夫不達天命之有歸	夫不達□□□□	夫不達天命之有歸	不達天命之有歸
13	易代之後	易代之後	易代之後	易代之後	異代之後	異代之後
14	崇祀帝王廟	崇祀帝王廟	崇祀帝王廟	享祀帝王廟	享祀帝王廟	享祀帝王廟
15	慨焉興嘆	慨焉興歎	慨焉興嘆(歎)	慨焉興嘆	慨焉興嘆	慨焉興歎
16	命地方春秋虔祀外	命地方春秋虔祀外	命地方春秋虔祀外	命地方官虔供春秋外	命地方官虔供春秋外	命地方官虔供春秋外
17	專官省視	專官省視	專官省視	耑官省視	耑官省視	專官省視
18	併令有司	併令有司	并令有司	并令有司	并令有司	并令有司
19	特景思於往哲	特景思於往哲	特景思於往哲	□□□□□□	特景仰於往哲	特景仰於往哲
20	封塋重煥	封塋重煥	封塋重煥	□□□□	封壤重煥	封壤重煥
21				順治十八年九月初六日立		
備注			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括號內的字見商務印書館的《十通》本。	□表示字跡模糊。	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括號內的字句見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內府刻本。	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括號內的字見光緒十年刻本。

上表是以〈順治碑文〉為中心而排列的，目的在顯示它與左右兩旁書籍所載碑文的關係。亦即是說，表內所列六篇碑文可分為兩組：第一組是《世祖章皇帝實錄》、《世祖章皇帝聖訓》和《皇朝文獻通考》所載碑文；第二組是〈順治碑文〉和《欽定日下舊聞考》、《畿輔通志》所載碑文。從表中第4、5(勅、勅、敕相同)、7、8、9、11、14、16、19九項可見，第一組的碑文和第二組的碑文來自兩箇不同的源頭，所以兩組碑文之間有顯著的分別。<sup>15</sup>

筆者懷疑，第一組的碑文來自碑文的原稿，第二組的碑文來自碑文的修訂本。在第一組的碑文中，《世祖章皇帝實錄》和《世祖章皇帝聖訓》所載碑文如出一轍，如果不計第6項(惟、維)和第15項(嘆、歎)中或體字的差異，兩書所載碑文其實完全相同。由此推論，這兩篇碑文保留了原稿的面目。至於《皇朝文獻通考》所載碑文，第18項中「并」字與「併」字同，固可不論；但第3項將「異世」改為「異姓」，獨異於諸書，相信是出於手民之誤。因此，第一組三篇碑文的差別可謂微乎其微。

第二組三篇碑文的統一性，遠遠不及第一組的碑文。如就〈順治碑文〉和《欽定日下舊聞考》所載碑文來說，除第6項(惟、維)用或體字外，第2項(時代、世代)和第13項(易代、異代)的歧異尤為觸目。不過，在這三篇碑文中，《欽定日下舊聞考》和《畿輔通志》所載碑文較為接近。後者的第1項、第12項雖脫去「及」、「夫」二字，但相信係手民之誤；至於第5項(勅、敕)、第15項(嘆、歎)、第17項(崑、專)則雖異而實同。因此，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畿輔通志》所載碑文，是直接抄錄自《欽定日下舊聞考》的。

## 二

清廷建立「康熙碑」一事，《聖祖仁皇帝實錄》、《皇朝通典》、《皇朝文獻通考》等書不載。《欽定日下舊聞考》雖收錄碑文，亦未提及立碑的原委。<sup>16</sup>現徵引〈康熙碑文〉如下，以便申述：

朕惟聖王制祀，昭德報功。禮官陳儀，修廢舉墜。所以挖揚曩烈，光表前王。訪弓劍於遺墟，葺園陵於豐草。垂諸簡冊，茂典彰焉。我國家纂受鴻圖，誕膺景命。下車伊始，爰命修祀前代陵墓。朕御寓以來，益深廬念。

<sup>15</sup> 然而，兩組碑文在第6、13、15、17、18諸項中，鴻溝並不明顯。至於第1、3兩項的歧異，可能出於手民之誤，不必固執於其同異。第12、19、20三項亦因〈順治碑文〉字樣模糊，不能確定彼此之間的分別是否一致。

<sup>16</sup>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三二〈京畿·房山縣三〉「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六下至八下(第499冊，頁116-17)；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內府刻本，第7冊，頁2122-23。

申勅有司，歲時展敬，於凡鞏護之道，無不備至。惟金朝房山二陵，當我師克取遼陽，故明惑於形家之說，謂我朝發祥渤海，氣脉相關，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剷斷地脉。三年，又建關廟於其地，為厭勝之術。從來國運之興衰，關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鑒，惟德是與。有德者昌，無德者亡。於山陵風水，原無關涉。有明末造，政亂國危，天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改圖，不思修德勤民，挽回天意，乃輕信虛誕之言，移咎於異代陵寢，肆行摧毀。迨其後，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無與，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于亂亡乎？古之聖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毀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夫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君哲辟，實光史冊。天聰三年，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寢在茲，追念鴻烈，特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蓋我太宗文皇帝訏謨偉烈，度越前王，乘輿所至，威德布昭，表遺徽而欽往哲，誠非常之盛事也。洎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隨享金太祖、世宗於歷代帝王廟，復命地方官春秋致祭陵寢，又諭禮臣崇官省視，修其頽毀，俾規制如初。朕纘承丕緒，緬溯前徽，特命所司，虔申禋祀，以昭繼述闡揚之意。嗚呼！梲岼依然，景金源於往代；榱楹宛在，溯蓼殿於當年。誌此遺風，勒諸貞石云爾。□熙二年九月初一立。<sup>17</sup>

〈康熙碑文〉除不見錄於清代重要官書外，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問題，更在以下兩點：第一，碑文中提及明朝摧毀金陵的歷史，與〈順治碑文〉所述多有出入；第二，〈康熙碑文〉的文字與文淵閣《四庫全書》內的《欽定日下舊聞考》所載碑文大相逕庭。

先說第一點。比對〈順治碑文〉與〈康熙碑文〉，我們不難發現兩篇碑文所述明朝對待金陵的行動雖然大同小異，但是有關事項發生的時間，則有顯著的不同。觀表列如下：

事項	〈順治碑文〉	〈康熙碑文〉
罷金陵祭祀	不提	天啟元年(1621)
剷斷金陵地脈	「前我師克取遼東」 (即天啟元年)	天啟二年(1622)
拆毀山陵	己巳(崇禎二年[1629])	天啟二年
建關廟於陵地	己巳	天啟三年(1623)

<sup>17</sup>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清二)》，第62冊，〈京〉9025，頁20。按：拓本部分文字模糊不清，由於《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內府刻本)所載碑文(參上注)與〈康熙碑文〉最為接近，現據之補入拓本本來不能辨識的文字，至於兩碑文字之間的出入，下文將會列出，此處不贅。

明朝殘毀金陵一事，筆者翻查明季清初史籍多時，始終未有發現。<sup>18</sup>但從常理而言，兩篇碑文既同出於「御製」，後出者當知道前出者的說法，而後出者竟提出新說，應該是前說未能入信。無論如何，這兩篇碑文敘事的矛盾，曾引起乾隆君臣的關注。《乾隆朝上諭檔》載有一篇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二十五日的奏疏。這篇奏疏是軍機大臣向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6在位)報告他們考查明朝殘毀金陵一事的結果。節錄如下：

<sup>18</sup> 近人對明朝殘毀金陵一事，卻有異乎〈順治碑文〉與〈康熙碑文〉的記載，舉例如下：  
(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合編的《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說：「萬曆末年，明朝君臣認為滿洲稱後金，是金代後裔，其興盛與金代陵墓有關。金代的帝王陵墓在北京房山縣的大房山，于是派人將金陵搗毀，以『斷其地脈』，『泄其王氣』。至天啟二年(1622年)更在金陵建立了一座關帝廟，以為『厭勝』。」(上冊，頁5)  
(二)楊仕、岳南的《風雪定陵——地下玄宮洞開之謎》(按：原書於1991年由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現據修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亦指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1572-1620在位)派人搗毀金陵。書中說：「萬曆見明軍已無力阻擋努爾哈赤〔1559-1626，1616-1626在位〕的鐵騎，卻通過太監找來陰陽術士王老七，施展陰陽之術，以破敵軍。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後，跪請皇帝說道：『女真人之北關，與其祖墳風水有關。如將房山金人陵寢搗毀，泄其王氣，明軍可能轉為勝矣。』萬曆皇帝聞聽此言，大為驚喜，努爾哈赤自稱『後金』，意為金人之後，于是諭令兵部急速派人趕往房山，搗毀金人陵寢。……明軍趕往房山金人陵區之後，大肆焚燒盜掘，整個陵區烈焰升騰，烟塵四起。不到兩個月，建築規模和歷史藝術價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遜色的房山金陵，毀壞殆盡。」(頁237)  
曹硯農的《古代帝王陵寢實錄》(長沙：岳麓出版社，1997年)說：「在努爾哈赤起兵問鼎明朝而萬曆皇帝朱翊鈞手足無措的情況下，一班陰陽家、方士對朱翊鈞說：清軍的入侵與後金陵寢有關，清是金的後裔，故自稱後金。金代的陵寢在大房山，何不去大房山搗毀後金的陵墓，以泄其『王氣』。萬曆皇帝信以為真，果然派人到大房山毀陵。……當金陵被毀後，明朝皇帝還下令在陵園上建一座關帝廟，以鎮壓後金的『王氣』。」(頁113)  
龐中威的《定陵發掘親歷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亦說：「在朱翊鈞當政的時候，努爾哈赤在東北興起，點聚人馬，屢次南向。在戰場上明軍的節節失利，使得明代統治者感到惶恐。這時候，詭詐巧辯的陰陽家術士們對朱翊鈞說：清兵的入侵與陵寢有關，清是金代的後人，自稱後金。金代的陵寢在大房山，為甚麼不去大房山，毀掉他的陵寢，以泄他的『王氣』呢？昏庸至極的萬曆，真的聽信了這些話，把金代陵寢搗毀了。並且，還在上面建立了一座關帝廟，以鎮壓他的『王氣』。」(頁9)然而，諸書所言，皆無真憑實據足以取信於人，何況抄襲的痕跡所在多見。其實，朱翊鈞未派人搗毀金陵，可從以下一事得到旁證。據顧大章(1576-1625)〈自敘刑曹事七條〉記載：「自天啟辛酉〔元年〕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姦細為事。」「兵部尚書張鶴鳴〔1551-1653〕奏……佟卜年〔1588-1625〕謀叛」。幾經審訊後，署刑部事的右侍郎楊東明(1548-1624)於天啟二年七月上疏，主張「宜誅」，其中一項罪名指言佟卜年「每歲拜金世宗墓」(載黃煜：《碧血錄》，《筆記小說大觀》本〔揚州：江蘇古籍刻印社，



至明代殘毀房山金陵一事，遍檢《明史》等書，均未記載。恭查《世祖章皇帝實錄》，於順治十四年有御製金陵碑文一道。又康熙二年有聖祖仁皇帝御製金陵碑文一道，恭查實錄及《御製文集》內，未經載入。惟《房山縣志》內恭載碑文，文內敘明代折〔拆〕毀金陵，係天啟二年事。謹恭錄實錄二條，並御製碑文二道，一併進呈。<sup>19</sup>

從上引奏疏可見，軍機大臣因為奉命考查「明代殘毀房山金陵一事」，從而發現世祖「御製金陵碑文」和「聖祖仁皇帝御製金陵碑文」所述明代拆毀金陵的時間不同。雖然他們沒有確指兩文誰是誰非，但僅謂後者繫其事於天啟二年，不提前者的異說，顯示在兩者之間，他們採納了後者的說法。至於弘曆本人的取舍，相信亦與軍機大臣相同，因為當他記述明朝殘毀金陵的史事時，祇徵引「聖祖仁皇帝御製金陵碑文」而已。<sup>20</sup>

接著說第二點。《欽定日下舊聞考》內府刻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內的《欽定日下舊聞考》同載有「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和「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其中「世祖碑文」雖大致吻合（詳上節表），但「聖祖碑文」則有很大的分別。在這兩篇「聖祖碑文」中，內府刻本的一篇與〈康熙碑文〉如出一轍；至於《四庫全書》本的一篇，則與〈康熙碑文〉大有逕庭。而更出人意外的是，《四庫全書》本中的「聖祖碑文」與「世祖碑文」（以及上節表中任何一篇「世祖碑文」，包括〈順治碑文〉），詞句相同之處竟有二百一十四字之多，佔「聖祖碑文」（共五百二十九字）五分之二。現將兩篇碑文表列如後，以見彼此之間的異同：

〔上接頁150〕

1983-1984年），卷上，頁一九下至二〇下（第7冊，頁1302）。由此可見，金世宗陵並未毀於萬曆朝。有關佟卜年被誣一事，另參陳鼎（1650-？）：《東林列傳》，《明代傳記叢刊》本（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三〈顧大章傳〉，頁一八下至一九下（第5冊，頁192-94）；錢謙益：〈陝西按察司副使贈太僕寺卿顧公墓誌銘〉，載《牧齋初學集》，卷五〇，中冊，頁1286-87；錢謙益：〈故明山東登萊監軍道按察司佟公墓誌銘〉，載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二九，中冊，頁1082-83。

<sup>19</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條，第7冊，頁193-94。另參注28。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的《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未有此奏的記錄（第24冊，頁537-38）。

<sup>20</sup> 弘曆在乾隆十八年（1753）作〈望大房山作歌〉，詩末兩句為「聖人穹碑揭日月，拱讀義盡休重論」，其下注謂：「本朝修復金太祖、世宗陵。聖祖御製碑文以前者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於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天啟初，拆毀金陵，剷斷地脉，又建關廟於其地，為厭勝之術。不思修德勤民，而移咎於異代陵寢，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云。」（載弘曆：《御製詩二集》，《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卷三九，頁三下至四上〔第3冊，頁103-4〕）此外，弘曆在乾隆五

〔下轉頁152〕

何冠彪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欽定日下舊聞考》		《康熙碑文》 / 《欽定日下舊聞考》內府刻本所載「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備注
世祖章皇帝 〈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			
自古膺圖受錄，咸有大功德於天下。	及	聖王制祀，昭德報功。禮官陳儀，修廢舉墜。所以挖揚曩烈，光表前王。訪司劍於遺墟，置園陵於豐草。垂諸簡冊，茂典彰焉。我國家集受鴻圖，誕膺景命。下車伊始，爰命修祀前代陵墓。朕御寓以來，益深厯念。申勅有司，歲時展敬，於凡鞏護之道，無不備至。惟金朝房山二陵，當	□內字在〈康熙碑文〉中模糊不清。
其沒也，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貺，實亦遐邇之所繹思。故	世		
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於當年，園寢湮於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九有，於前代陵墓，未嘗不惓惓於心，申勅所在，守護惟謹。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	時		
我師克取遼			
東，		陽，	「脉」字，《欽定日下舊聞考》內府刻本作「脈」。
疑與		故明惑於形家之說，	
本	清	謂我朝發祥渤海，氣脉	
朝王氣		相關，	
遂	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		
屬斷			

〔上接頁151〕

十年(1785)作〈謁明陵八韻〉，詩中有注說：「我朝修復金太祖、世宗陵。聖祖御製碑文以前者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於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天啟初，拆毀金陵，屬斷地脈，又建關廟為厭勝之術。不思修德勤民，而移咎於異代陵寢，尤為舛謬。」(載弘曆：《御製詩五集》，《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本，卷一四，頁二上至二下〔第8冊，頁432〕)

其		
	地脉。	「脉」字，《欽定日下舊聞考》內府刻本作「脈」
又己巳歲，我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念金朝先德，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明復加摧毀，且	三年，又	黑線上數句略見於「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及〈康熙碑文〉下文。 □內文在〈康熙碑文〉中模糊不清。
	建	
立		
	關廟	
	於其地，	
	為厭勝之術。	
夫不達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於	從來國運之興衰，關乎主德之善否， <u>上</u> 天降鑒，惟德是與。有德者昌，無德者亡。於山陵	□內文在〈康熙碑文〉中模糊不清。
	風水，	
移災於林木，何其誕也！	原無關涉。有明末造， <u>政</u> 亂國危， <u>天</u> 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改圖，不思修德勸民，挽回 <u>天</u> 意，乃輕信虛誕之言，移咎於異代陵寢，肆行摧毀。迨其後，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無與，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於亂亡乎？古之聖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 <u>毀</u> <u>及</u> 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夫	□內文在〈康熙碑文〉中模糊不清。 左文第二箇「於」字，〈康熙碑文〉作「于」。
	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君哲辟，實光史冊。	「君」字，「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作「主」。
乃異代之後，兆域荒圯，祀典缺廢，撫今追昔，慨焉興嘆。	天聰三年， <u>太宗</u> 文皇帝統師入關，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寢在茲，追念鴻烈，特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蓋我 <u>因</u> <u>宗</u> 文皇帝訐謀偉略，度越前王，乘輿所至，威德布昭，表遺徽而欽往哲，誠非常之盛事也。洎 <u>世</u> 祖章皇帝定鼎中原，隨享	□內文在〈康熙碑文〉中模糊不清。 黑線上數句略見於「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文)」前文。
		「略」字，〈康熙碑文〉作「烈」，〈欽定日下舊聞考〉內府刻本作「畧」。
金太祖、世宗		
已經享祀	於歷代	
帝王廟，		
其陵寢命地方官虔供春秋外，茲特	復命地方官春秋致祭陵寢。又	
諭禮臣耑官省視，修其頽毀，俾規制如初。		
并令有司時祭無斁。	朕纘承丕緒，緬溯前徽，特命所司，虔申禋祀，以昭繼述闡揚之意。	□內文在〈康熙碑文〉中模糊不清。
嗚呼！		
廟貌既崇，特景仰於往昔，封壤重煥，用昭示於來茲。爰勒貞珉，以垂不朽云爾。	睨岷依然，景金源於往代；棧楹宛在，溯蓼殿於當年。誌此遺風，勒諸貞石云爾。□熙二年九月初一立。	黑線上一句〈欽定日下舊聞考〉內府刻本缺。

「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為何有兩箇截然不同的本子？為何《欽定日下舊聞考》的《四庫全書》本與內府刻本所載碑文並不相同？這兩箇問題，都必須向《乾隆朝上諭檔》尋找答案。

《乾隆朝上諭檔》載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的奏疏。奏疏說：「臣等謹將《日下舊聞考》所載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夾簽進呈。俟發下後，再行擬改呈覽，另為鐫刻。謹奏。」<sup>21</sup> 誠如上文指出，十六年前，軍機大臣因為奉命考查明朝拆毀金陵一事，曾將《世祖章皇帝實錄》所載「聖祖〈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與《房山縣志》所載「聖祖〈御製金太祖、世

<sup>21</sup> 《乾隆朝上諭檔》，第14冊，頁650。按：此奏即《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所述該日〈奏片三件〉之三「《日下舊聞考》所載〈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夾簽進呈」的奏片(第40冊，頁708)。

宗陵碑文」進呈御覽。今次進呈的，則是《欽定日下舊聞考》內載的碑文。<sup>22</sup>雖然奏疏中沒有說明弘曆為何要軍機大臣進呈兩篇碑文，但所謂「再行擬改」與「另為鑄刻」，無疑在說弘曆要修改碑文。不過，為何要修改碑文及修改一篇還是兩篇碑文，奏疏始終沒有交代。幸而，《乾隆朝上諭檔》另有軍機大臣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三日的奏疏，報導了修改碑文一事的下文。再錄如下：

前蒙發下《日下舊聞考》一本，內聖祖〈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與世祖御製碑文，有詞句相同之處，令臣等酌改。今敬謹擬改，粘貼黃簽呈覽，伏候欽定。俟發下，臣等交武英殿改刊；并行知直隸總督〔劉峩〕，將原碑另行磨刻。謹奏。<sup>23</sup>

由此奏疏可見，弘曆發現《欽定日下舊聞考》內的兩篇〈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有詞句相同之處」，於是命令軍機大臣修改「聖祖御製」的碑文，使兩文不再有相同的詞句。

本來，弘曆在十六年前已同時讀過兩篇御製碑文，他應該在當時就發現它們的詞句相同之處甚多。或許，當時的關注點在明朝拆毀金陵的始末，加以兩碑的來源不同，弘曆亦不是要將它們一起刊行，它們有否詞句相同，可謂無關宏旨。可是，《欽定日下舊聞考》刊刻以後，<sup>24</sup>由於兩篇「御製」碑文在書內一併排列，讀者不難發現它們詞句相同之處，這樣便有失朝廷的體面了。因此，碑文在這時便有修改的需要。

<sup>22</sup> 這次不是弘曆十六年來首次再對金陵關注。乾隆五十二年(1787)初，他曾命直隸總督劉峩(?-1795)調查金陵。軍機大臣接到劉峩的回覆後，向弘曆報告說：「據劉峩查覆，金陵在房山縣地方。乾隆十八年(1753)，聖駕親臨展謁，曾有御製詩章。至金太祖、世宗陵，國朝屢加修葺，詳見御製詩註。謹夾簽進呈，並將劉峩查到原片呈覽。謹奏。」(《乾隆朝上諭檔》，「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五日」條，第13冊，頁726。按：《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未有此奏的記錄〔第39冊，頁160-63〕)。按：文中所謂「御製詩章」，應指注20所引〈望大房山作歌〉，以及前文未提及的〈謁金太祖睿陵〉和〈過金世宗陵留句〉(《御製詩二集》，卷三九，頁一〇下至一一上〔第3冊，頁107〕)。

<sup>23</sup> 《乾隆朝上諭檔》，第14冊，頁747。按：此奏即《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所述該日〈奏片一件〉「《日下舊聞考》內碑文相同之處擬改進呈，原書同遞」的奏片(第41冊，頁43)。

<sup>24</sup> 《欽定日下舊聞考》約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軍機大臣於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上呈弘曆的〈各館現辦各書酌定完竣日期清單〉中，在「《日下舊聞考》」一目下注說：「已進過一百六十六卷，未進約二十卷，計期於本年十二月完竣。」(《乾隆朝上諭檔》，「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條，第11冊，頁231。按：此奏即《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所述該日〈奏片一件〉「酌定各書限期，同單遞」的奏片〔第34冊，頁366〕)。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奏報修書進度時，則說：「《日下舊聞考》……經依限完竣。」

弘曆看過「聖祖〈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的修訂後，大抵立即就將碑文發還，而「辦理軍機處」亦不敢怠慢，於當天即將「《日下舊聞考》所載原文，交武英殿遵照改刊」。又「將碑文前後改定之處，抄錄移咨」直隸總督，「即飭地方官遴選妥工，將原碑全文另行磨刻」。<sup>25</sup> 透過軍機大臣的奏疏和咨文，可見現時所見房山的

〔上接頁155〕

（同上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條，第11冊，頁569。按：此奏即《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所述該日〈奏片一件〉「考覈各館纂辦書籍，單同遞」的奏片〔第35冊，頁59〕）接著在二月五日，便由大學士英廉（1707-1783）奉表將書進呈（《欽定日下舊聞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表文〉，頁九下〔第497冊，頁6〕。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內府刻本所載表文不著年月）。然而，該書後來仍有增纂（《乾隆朝上諭檔》，「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六日」條，第12冊，頁209-10。按：《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未有此奏的記錄〔第36冊，頁482-84〕）。但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則已經由《四庫全書》館校訂，並寫入《四庫全書》中（參注27）。但是，《欽定日下舊聞考》刊行於何時，不可確考。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內府刻本時說：「書中有乾隆五十年的詩，出書應不早於乾隆五十年。《光緒順天府志》記敘乾隆五十三年此書已刊行。」（〈出版說明〉，第1冊，該說明頁6-7）可是，上述說法不盡不實。首先，該書所載的資料，有遲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才面世的。例如，卷一三六〈京畿·昌平州三〉便載有一篇乾隆五十二年的上諭和一首不著撰年的〈御製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第7冊，頁2188-9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沒有上述諭文及題句）。這篇上諭責成地方官員保護明代陵寢，乃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九日發，現收錄於《乾隆朝上諭檔》，第13冊，頁730（按：此諭即《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所述該日〈上諭一道〉「明陵每年十月工部派官員勘驗等由」的上諭〔第39冊，頁170〕）。至於題句，亦是乾隆五十二年作，見弘曆：《御製詩五集》，卷三二，頁二〇下至三四下（第8冊，頁762-69）。其次，由於北京古籍出版社沒有交代所言《光緒順天府志》說的出處，使人不詳究竟。不錯，該志的〈藝文志一·紀錄順天事之書〉中確有「《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一目，但其下祇是注「乾隆〇年刊本」而已（周家楣〔1835-1887〕等：《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一二二，第15冊，頁6361）。無論如何，《欽定日下舊聞考》在乾隆五十二年尚在刊刻階段，而且所用板片，是當年從各部清查出來的「各部則例」的「舊板」（《乾隆朝上諭檔》，「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九日」條，第18冊，頁898。按：此奏即《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所述該日〈奏片三件〉之二「查各部則例動項刊刻由」的奏片〔第46冊，頁270〕）。然而，《欽定日下舊聞考》至遲在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已刻成，因為軍機大臣在該月二十四日已將《欽定日下舊聞考》所載兩篇〈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夾簽進呈」，並說待弘曆「發下後，再行擬改呈覽，另為鑄刻」（同注21）。其次，他們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呈上修改過的「聖祖〈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時又說，該碑文獲弘曆認可發下後，將會「交武英殿改刊」（同注23）。所謂「另為鑄刊」及「改刊」，證明《欽定日下舊聞考》原已刊成。另參注26。

<sup>25</sup> 《乾隆朝上諭檔》，「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條，第14冊，頁748。按：《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未有此咨文的記錄（第41冊，頁43-44）。

〈康熙碑文〉和《欽定日下舊聞考》內府刻本的「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乃乾隆五十四年的修訂本，並非原來筆致。<sup>26</sup>

至於《四庫全書》內的《欽定日下舊聞考》，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已經完成，<sup>27</sup>早在該書刊行以前。而當該書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改刊的時候，軍機大臣忘記了《四庫全書》內的《欽定日下舊聞考》亦須作相應的修改。幸而，錯有錯著，就是因為有此漏網之魚，我們才可以知道「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的原來面目。

### 三

如果我們相信〈順治碑文〉和〈康熙碑文〉上刻的立碑日期(即「順治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和「康熙二年九月初一日」)，「順治碑」和「康熙碑」建立的時間，不過相距兩年。如果我們採納《世祖章皇帝實錄》的記載，相信「順治碑」原在「順治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建立，則兩碑的建立，也不過相差六年。從《四庫全書》本《欽定日下舊聞考》內載的「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與「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所見，兩篇碑文不但內容相近，詞句更多有重複。清廷為甚麼在短短二年或六年間建立兩塊如此類似的「金太祖、世宗陵碑」？

正因兩碑建立的時間相距甚短，加以兩篇碑文的內容與詞句相同之處甚多，我們必須從兩篇碑文相異之處著眼，才能解疑釋惑。誠如前文指出，兩篇碑文在內容方面最明顯的分別是兩者所述明朝殘毀金陵的時間不同。清廷在短短數年間，

<sup>26</sup> 北京古籍出版社在《欽定日下舊聞考·出版說明》說：「我們根據內府刻本排印。原刻有兩個印本。一個字樣較清楚，較少斷線壞字，我們稱為初印本。一個字樣較模糊，有斷線壞字，我們稱為後印本。……我們是根據後印本排印的。個別地方根據初印本校訂。」(第1冊，該說明頁7)然而，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所載「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與〈康熙碑文〉不但如出一轍，而且與「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已無詞句相同之處，顯見它的底本(即所謂「後印本」)乃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以後的改刊本，絕非原刻本。另一方面，由於排印本沒有指出「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在所謂「初印本」有很大的不同，則此「初印本」亦是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以後的改刻本，不可能是「原刻」。至於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的《故宮所藏殿板書目》(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排印本，民國二十二年〔1933〕)謂該館所藏「《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為「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本」(卷二〈史部·地理類〉，頁四下)，更是錯誤。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合編的《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則沒有交代《欽定日下舊聞考》的纂修經過與刊刻日期(〈史部·地理類〉，「《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條，頁277-79)。

<sup>27</sup> 見紀昀(1724-1805)等撰《欽定日下舊聞考》提要，載於《欽定日下舊聞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目錄〉，頁二二下(第498冊，頁23)。

不惜自相矛盾，提出異乎福臨論文和御製碑文的說法，不能不使人懷疑福臨所述史事的可信性。誠然，康熙二年清廷撰寫新的〈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時，不可能不知道福臨論文和碑文的說法。況且，新碑文根本是從舊碑文脫胎出來，因此才有五分之二篇幅與舊碑文相同。而新碑文在抄襲舊碑文之餘，竟然提出相異的說法，無疑是因為清廷當時發現舊碑文記載有誤，為了急於改正，於是便以年僅十歲的玄燁為名，以舊碑文為底本，「御製」新的碑文。由於新碑文的任務在正視聽之訛，因而將集中力放在改正史事記載的錯誤。至於新舊碑文的內容是否相近，詞句是否重複，則不予理會。如此這般，新碑文之異於舊碑文者，祇在所述明朝殘毀金陵的時間不同、譴責明朝的語調較重、表揚皇太極的篇幅稍添及玄燁崇祀金陵的內容新增而已。而其開首與結尾，則逐錄自舊碑文，不作改動。

雖然軍機大臣於乾隆三十七年與五十三年兩度向弘曆進呈「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但他們不是往房山抄錄原碑，而是依據《房山縣志》與《欽定日下舊聞考》內載的碑文。<sup>28</sup> 所以乾隆君臣都不知道〈康熙碑文〉上有「康熙二年九月初一日立」一句，因而忽略了立碑之時，玄燁仍係孩童，立碑不可能是他的主意，碑文也不可能由他操筆。因此，弘曆稱「康熙碑」為「聖人穹碑」；<sup>29</sup> 史官稱它為「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sup>30</sup> 稱碑文為「聖祖御製碑文」；<sup>31</sup> 以及軍機大臣先後稱碑文為「聖祖仁皇帝御製金陵碑文」、「聖祖〈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嚴格而言，皆不恰當。

固然，所謂「御製文」，不一定出自皇帝手筆。但一般而言，文章應由皇帝授意，稿本亦經皇帝確認後才面世。可是，這篇碑文既非玄燁授意，亦未經玄燁審

<sup>28</sup> 軍機大臣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呈弘曆的《房山縣志》所載碑文，不知是來自康熙三年(1664)刊刻的「《房山縣志》十卷」本，抑或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刻的「《房山縣志》十卷、《續志》一卷」本(參看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市〉，頁5)。筆者所見馮慶瀾等重修的《房山縣志》(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則沒有收錄任何〈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不過，在書內〈金石〉中，則有「金太祖、世宗陵碑」、「康熙金帝陵碑」二目，其下注均謂：「清刻，在車廠北。」(卷三，頁三六上)前者當係「順治碑」，後者則是「康熙碑」。雖然筆者未見康熙三年或康熙三十七年刊刻的《房山縣志》，但所見其他史籍(包括方志)收入的〈順治碑文〉或〈康熙碑文〉都沒有立碑年月，所以推測康熙年間纂修的《房山縣志》內的「聖祖御製碑文」亦如此。

<sup>29</sup> 參看注20。

<sup>30</sup> 嵇璜等：《皇朝通志》，《十通》本，卷一一九〈金石略五·石四·直隸〉，第12冊，頁7415。

<sup>31</sup> 和珅(1750-1799)等：《欽定大清一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部〉232〈地理類〉)，卷七〈順天府四·陵墓〉，頁一七下(第474冊，頁155)；穆彰阿(1782-1856)等：《欽定大清一統志》，《四部叢刊續編》本，卷九〈順天府四·陵墓〉，頁一四上。



定。所謂「御製」，不過因為當時由他做皇帝而已。無怪這篇碑文沒有收入他的《御製文集》中。其次，如果「康熙碑」建立的目的是在於正「順治碑」的缺失，本身就不是一件馨香的事情，《聖祖仁皇帝實錄》不載其事，亦不出奇。或許就因為實錄缺載其事，所以《皇朝通典》、《皇朝文獻通考》僅記述了福臨立碑的始末，沒有提及「康熙碑」或〈康熙碑文〉。剛剛相反，《皇朝通志》祇有「康熙碑」的紀錄，沒有提到「順治碑」或「順治碑文」。<sup>32</sup>事實上，除《欽定日下舊聞考》外，不見有其他清代的官書同時收錄〈順治碑文〉與〈康熙碑文〉，又或一併紀錄「順治碑」與「康熙碑」的存在。

最後指出，康熙初年撰的〈康熙碑文〉雖然草率，但到乾隆末年，已是一百二十多年的文獻。弘曆竟因它與〈順治碑文〉詞句相同而下令修改，及「將原碑全文另行磨刻」，其對待典章文物的態度，可見而見。既然連他口中稱道的「聖人穹碑」都可以竄改，有何文物與案卷不可更易？進而言之，乾隆官書所記史事、所載史料，其真確的程度，不能令人無疑，想下去更令人不寒而慄。

同注30。

#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Two “Imperial-composed Monumental Inscription for the Tombs of Jin Taizu and Shizong” in Early Qing

(A Summary)

Koon-piu Ho

There are two steles for the Tombs of Jin Taizu 金太祖 and Shizong 世宗 (“the Tombs”) erected in early Qing in Chaichang 柴廠 of Fangshan 房山. On each of the steles there was inscribed a text of the same title “Imperial-composed Monumental Inscription for the Tombs of Jin Taizu and Shizong” (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texts are not identical. According to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themselves, the steles were erected on 28 October 1661 and 1 October 1663 respectively. However, according to some Qing official records, the first stele was erected on 28 July 1657, whereas no record for the erection of the second stele is found.

In addition to the discrepancies on the dates of its erection, the contents of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 on the first stel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exts recorded in some Qing official works. For example, som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are found in the texts collected by the *Shizu Zhang Huangdi shilu* 世祖章皇帝實錄, the *Shizu Zhang Huangdi shengxun* 世祖章皇帝聖訓, and the *Huangchao wenxian tongkao* 皇朝文獻通考.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xt on the first stele is more similar to the texts recorded in the *Qinding Rixia jiuwen kao* 欽定日下舊聞考 and the *Jifu tongzhi* 畿輔通志.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at those texts in the *Shizu Zhang Huangdi shilu*, the *Shizu Zhang Huangdi shengxun*, and the *Huangchao wenxian tongkao* are corrupted. Instead, they may be based on earlier drafts but not the version of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 as it was finally inscribed on the stele.

The present monumental inscription on the second stele is not the original.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 of the second stele had heavily copied the inscription of the first stele and was erased and replaced in 1789. The purpose of erecting the second stele by the Qing court in 1663 was initially to override the first stele, which had been found to be inaccurate in the years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ombs. As the major concern at that time was to maintain an accurate historical account, almost two-fifths of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 of the second stele was copied from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 of the first stele. Although the two steles were erected in the same place, their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had never been collected or published together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Qinding Rixia jiuwen kao* in about 1788. Attention was drawn to the repetitions in these two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since then. Emperor Qianlong 乾隆 could not tolerate such repetitions, and so he ordered his grand secretaries to revise the text of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 of the second stele.

After the revised text was approved, Emperor Qianlong ordered the same to be



## Two "Imperial-composed Monumental Inscription for the Tombs of Jin Taizu and Shizong"

161

inscribed on the second stele. At the same time he decreed a reprint of the *Qinding Rixia jiuwen kao* to reflect the changes made. However, both the Emperor and his officials forgot that the original *Qinding Rixia jiuwen kao* had already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Siku quanshu* 四庫全書.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 of the second stele is thus preserved.

